

1
2001



苗侗文坛

MIAODONG WENTAN

..... 舒向今 (34)

从花山节看苗族的婚姻变迁

..... 罗兴贵 (47)

浅谈苗族芦笙的起源及社会功能

(美)Daniel B. Wright 著 (10)

..... 徐新建 译

刻不容缓地保护好不可再生的民族

文化资源..... 谭继尧 (17)

雷山苗族的物质文化

..... 周 星 (20)

五溪先民史前时期经济生活概论

..... 舒向今 (34)

从花山节看苗族的婚姻变迁

..... 罗兴贵 (47)

浅谈苗族芦笙的起源及社会功能

..... 张永祥 (57)

吴德坤

苗语和侗语的“芦笙”语源札记

..... 李炳泽 (64)

浅谈苗族“议榔”制在社会组织中的作用

..... 杨 诚 (68)

婚姻风俗“铺帐”考

..... 李 晖 (72)

侗族“情人歌”的“失恋”认物形象阐释

..... 张泽中 (83)

巧设陷阱擒老虎

..... 龙燕怡 (90)
龙民怡

高手妙法猎野鸡

..... 龙燕怡 (97)
龙民怡

也谈淑浦蛮夷的历史文化和族属

..... 石宗仁 (101)

月亮山清代湖南苗族移民考

..... 吴正光 (115)

苗疆土司与苗族

..... 吴曦云 (121)

楚祖祝融即苗语“龙”

..... 龙 琳 (127)

张秀眉领导苗民反抗民族压迫 (续)

..... 唐春芳 (136)

英雄伟业 光照千秋

——苗疆访古

..... 秋 阳 (149)

《中国苗族通史》评价

..... 翁家烈 (160)

封面设计..... 石俊生

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意识的主体透视

□ 朱慧珍

民族意识指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对客观外界反映、认识、评价的总和,而传统的民族意识则是在长期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流传、积淀下来的民族意识,它包括民族观念和民族心理等。民族风俗、文艺、道德、哲学是民族传统意识的表现形式。研究民族传统意识离不开它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风俗。

民族传统意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民族传统意识在一定的民族生活、社会环境中形成,又反过来影响民族的生活和行动,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先进的民族意识可以引导一个民族走向进步和繁荣,落后的乃至反动的民族意识也可以促使一个民族趋向倒退以至灭亡。剖析民族传统意识及其外化形式——风俗,将它们作为一个具有多质多层次的开放系统进行多侧面的立体透视,将有助于我们制定符合于民族特点的政策措施,有助于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克服民族的落后面,以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民族能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这对于尚处于后进状态的偏远地区少数民族来说则显得更为重要。

以往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意识、风俗的看法存在着以下三种偏向:一是只看到民族意识的长处,甚至将其中落后的东西当作精华来赞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弘扬民族精神,不然就有贬抑、污蔑少数民族之嫌;另一种倾向则相反,他们只看到民族传统意识的短处和不足,似乎少数

民族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还有一种倾向则是将少数民族传统意识绝对化，固定化，好则全好，坏则全坏，而且永远如此，没有发展观点和辩证统一的观点。以上几种看法既不符合民族的实际，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本文力图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以南方少数民族为例，对少数民族传统意识、风俗进行立体透视，以便对少数民族传统意识和风俗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

本文分为三大部分：〈一〉民族传统意识既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没有天生的优等或劣等民族；〈二〉同一种民族意识或风俗往往具有进步与落后，美与丑的二重性：在民族优良传统中往往潜伏着消极的因素，某些今天看来是落后的习俗在它形成之时可能具有某种进步的历史作用；〈三〉民族传统意识是发展变化的，有顺向（正向）变化和逆向变化。

（一）

民族传统意识作为一个系统，它的质具有多面性，对民族传统意识、风俗进行立体透视首先应当看到它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列宁曾经指出：“要真正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虽然不完全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①对少数民族传统意识和风俗的看法也应当要求全面性，任何一个民族，他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维持生存、发展，就必然会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因此，看待民族意识就必须首先看到他的长处。比如，少数民族的团结互助，内聚力强，群体观念浓厚，勇敢勤劳，艰苦朴实，热情好客等，正是这些优秀品格和信念支持着他们战胜种种困难，闯过一道道艰难险阻，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例如苗族，在历史上是一个经历了长时间、大幅度、远距离迁徙的民族，是一个受尽剥削压迫和人间苦难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后因在部落纷争中战败而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其后又被历代统治者袭击和驱赶，由长江中下游一路跋涉，迁移到西南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其中一部分苗族则逃亡国外。但苗族靠着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团结协作、患难与共的强大的内聚力多次战胜了残酷的

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维持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加之建国后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使苗族最终发展成为今天上千万人口的民族，仅国内苗族人口就有七百多万（1992年统计），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五位。其他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如瑶族、侗族、仡佬族、彝族、独龙族等都有过与苗族类似的艰难处境和精神品格。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历史的、阶级的、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少数民族也确实存在着一些落后面，如早婚早恋，族内婚，近亲结婚，不落夫家，狭隘保守，轻商鄙商，迷信鬼神等。这些落后习俗危害了民族的健康，影响了民族素质的提高，制约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婚俗为例，不少苗族、侗族、瑶族地区，女孩长到十三、四岁即参加“坐妹”、“踩月亮”、“踩花山”、“爬楼梯”等男女青年的社交活动，十五、六岁便开始恋爱结婚，而且不允许与外族通婚。瑶族《过山榜》有“盘王之女不嫁汉家民”的规定，阳朔瑶族有“瑶不穿出，民不穿进”（即瑶汉不通婚）的戒律。南丹瑶族有“鸡对鸡，鸭对鸭，瑶族不与外人打亲家”的说法。苗族有“苗不沾客”之说，苗族还有句俗语：“我们民族是藤树根连根，稀饭泡汤清（亲）上加清（亲）。”草苗在建国前严禁与外族通婚，如有违反者，将其赶出村寨，在家门口钉上齿耙，再淋上鸡血，说“如耙生根长叶外嫁女才能回家”。苗、瑶有的支系不但不与外族通婚，而且同是苗族、瑶族，由于各支系语言、服饰不同也不通婚。于是通婚范围只限制在极狭小的范围之内。而且部分壮、侗、苗、瑶族还有姑舅表婚的习俗，俗称“还娘头”或“还舅门”，其习俗规定姑母之女一定要嫁给舅舅之子。如违反此成规，姑家需向舅舅交“洗面钱”，意为洗去娶不到姑女之耻辱。此俗在建国前甚为流行。建国后在部分地区仍保留。由于实行近亲结婚，导致人口素质的下降，多表现为身材矮小，发育不良，智商不高。据杨文金对镇宁地区革利100位苗族男性调查显示：

第一代50人，平均年龄55岁，身高最高1.7米，最矮1.45米，平均身高1.56米。第二代50人，平均年龄23岁，最高1.61米，最矮1.32米，平均身高1.51米。两代人比较，第二代人平均身高下降4.96公分，胸围小3.92公分，体重减轻5.43公斤。普遍达不到服兵役标准，革利乡自1981年以来连续7年服兵役无一人体检合格。近亲结婚还严重影响

人的体力智力,革利乡一汤姓苗族,两代旁系血亲婚配,生了7个孩子,其中4个聋、哑、残、缺,另外三个智力也很差。^②如此素质,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迷信鬼神的观念不仅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且夺去了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的生命。狭隘保守、满足于现状的思想观念阻碍了少数民族去向其他先进民族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更影响他们改革开放、开拓进取。

以上列举少数民族的一些弱点、缺点,其本意决不是想说明少数民族是天生落后的,而是要让少数民族清醒地认识自己、以克服缺点,加快前进步伐。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世界之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③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边远少数民族之所以存在一些落后面是由于历史和环境造成,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苗、瑶、侗、彝、仡佬等少数民族多生活在边远的山区,甚至有的还生活在人烟稀少的高山之上,密密森林之中,交通不便,通讯闭塞,环境恶劣又多聚族而居,与外界交往少。加上建国前长期受到反动派,地主贵族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民族歧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才形成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意识和习俗。有的习俗(如族内婚、聚族而居等)甚至是为维系民族的生存而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今天,我们既要看到少数民族的落后意识、习俗是历史和环境造成,而不应当是责怪少数民族落后;另一方面,又不应当掩盖这些既定的事实,而应当把它指出来,加以历史的分析,并启发民族自己去改变它,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跨世纪的需要。

(二)

对少数民族传统意识、风俗的立体透视不仅要看到其长处和短处,先进面和落后面,而且还应看到每一种意识和风俗往往具有美丑、好坏,进步与落后的二重性。例如少数民族的团结友爱内聚力强、群体观念浓厚,这是他们的传统美德,是少数民族战胜敌人和困难的基础。在民族压迫深重的旧时代尤其重要。许多少数民族就靠着这种团结友爱,

互相帮助的内聚力和群体观念一次次打败了反动派的进攻,维护了山寨的安宁。就是靠着这种互济互动的精神战胜了自然带来的灾难和困难,使民族得以生存。但也应当看到,建立在较为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基础的一族之间的团结、内聚力,往往又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凡属本族人(无论剥削阶级还是劳动人民)一律视为兄弟,凡是外族人则带着几分警惕,甚至加以排斥。将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不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不向先进民族学习,致使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在基本消灭剥削压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显得更加不合时宜,无产阶级是国际主义者,不但要团结本民族人民,而且要团结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打开寨门,打开国门,将眼光从本民族的狭小范围内扩展开去,放眼全国,放眼世界,从广阔的世界中吸收信息,吸取营养,才能使民族振兴,使民族走进世界先进行列。

又如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这也是少数民族的美德,但其中也隐含着浪费、爱面子的不良因素。少数民族以热请好客著称,有客来访,必倾其所有热情接待,而酒是必不可少的待客之物,有的扯耳朵灌酒,有的“搭楼梯”灌酒,有的唱敬酒歌敬酒。直至将客人灌醉方休。苗族最大的节日——拉鼓节,四方八寨的人都赶来参观、助兴。此时家家杀牛宰猪,无论你走到哪家都会使你酒足饭饱。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少数民族同胞热情、大方、豪爽的美德。但大肆招待宾客,往往弄得经济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倾家荡产,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少数民族嗜酒的问题。“酒”曾经被许多艺术家渲染和歌颂,有酒歌、酒诗、酒舞、酒戏,酒几乎成了少数民族的代名词。而笔者认为,少数民族这种酒文化也具有二重性:酒是少数民族交际、沟通感情的纽带,热情劝酒表现了少数民族真诚豪爽,热情大方的美德,且适量饮酒还可活血养身。但如果发展到酗酒、每喝必醉的地步则不仅有伤身体,且大量浪费粮食、钱财,影响生产和生活。不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粮食不能自给,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但每当收获粮食之后便大量酿酒。逢年过节,婚丧喜事,建屋上梁,朋友来访,人人喝得酩酊大醉,东倒一个,西倒一群,有的甚至因酒精中毒而断送了生命,有的乡村干部也经常处在半醉不醒

的状态之中，严重影响了工作。更有甚者，有的人家在春节前后将粮食耗光之后，春耕开始就靠救济过日子。少数人甚至将政府发给的救济衣物、棉被也拿去换酒喝。严重影响了生活和生产。据调查，许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消费，食品支出占的80%左右，其次是婚丧喜事和建房支出，文化和生产投资寥寥无几。而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有新的投入，这就需要积累。如吃光用光，没有资金或很少资金投入再生产，那么来年的生产又只能是单一的、粗放的、低产量的。于是便形成了落后的生产——超前的消费——生产的落后的恶性循环。民族经济的腾飞便成了一句空话。

不仅是一些民族优良品质具有二重性，就是一些今天看起来已经是落后的意识和风俗也往往具有二重性。如鄙商轻商的观念在今天商业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显得很不合时宜，甚至这种观念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但在形成这种意识的那个时代，它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社会里长期受到奸商的盘剥，如：盐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一些奸商将盐运到少数民族地区，以高出普通价的十几倍至几十倍的价格出售给少数民族人民。糖是边远少数民族难得的奢侈品，奸商以高昂的价格向少数民族出售。一些地区的侗族、苗族将自己自产的茶油、桐油拿到集市上去换取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奸商不但拼命压低价格，而且在秤头上做手脚。明明是60斤油，到奸商手里成了40斤，对此，侗、苗胞们咬牙切齿，但却敢怒而不敢言。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形成了他们的“轻商鄙商”的观念。在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同胞跟里，商人是最没有良心的，是最不道德的。由此可见，轻商鄙商的观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剥削，反压迫的积极内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诚实善良，不损人利己的纯朴心灵。又比如不与外族通婚，实行族内婚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的，应当改革。但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在当时仍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在旧社会里，少数民族人口少，且由于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差，婴儿成活率低，平均寿命短，迫切需要发展本民族人口，壮大本民族的力量，以抵抗外来势力的压迫。这是其一，其二是反动官府，贵族地主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压迫、民族歧视，使民族关系紧张，尤其是与汉民族关系紧张，这便形成了拒绝族

外婚,实行族内婚的观念和习俗。当然,这种族内婚在当时就表现出了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以上事实说明,相当一部分民族传统意识和习俗都具有两面性,我们既要看到它的正面,又要看到它的负面,既要看到某些观念、风俗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又要看到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落后性和负面效应。只有作全面的、辩证的历史分析、才能启发少数民族群众去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赶上时代前进步伐。同时,也可以使汉族人民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少数民族,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共同前进。

(三)

民族传统意识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它必然要向外界进行信息交换,在信息交换中使系统的质发生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的变化,因此,对民族传统意识和风俗进行立体透视还必须看到意识和风俗是发展变化的。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會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④少数民族传统意识、风俗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也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生变异。由于在社会生活中所吸收的信息量和质不同,使传统民族意识的变异呈现复杂的状况,有的意识发展变化快速,有的发展变化缓慢。有的顺向发展,有的逆向发展。变化发展快的如族内婚、“不落夫家”等习俗。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压迫的逐步消除,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关系的改善,少数民族大多已与外族通婚。而随着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广大少数民族青年获得了自由婚姻的权利,在自由恋爱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落夫家”的习俗也就逐步解体。由三年两载的不落夫家到一年半载的不落夫家到三、五天的形式上的不落夫家,甚至有的—结婚就长住夫家。这种变化是由于社会的巨变而造成。变化缓慢的如早婚早恋,多子多福,迷信鬼神等,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相当盛行。据杨文金同志对镇宁县革利乡调查:1980年至1986年有62对青年结婚,一方或双方不到法定年龄的有40对,占65%。结婚隐瞒真实年龄(报大岁数)或因不到结婚年龄而托关系、走后

门,甚至不登记就结婚的也大有人在,迷信鬼神的观念和习俗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则更为流行。有的地方没钱盖学校,适龄儿童上不了学,但热心捐钱盖庙宇。以上这些习俗变化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意识具有相对稳定性,一些观念习俗早已形成,代代相传,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二是文化水平低,科学知识不普及,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文盲、半文盲仍占多数,他们不能用科学的眼光解释疾病、灾难等现象。三是经济落后,医疗条件差,养老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治病问题缺乏客观物质基础。如早婚早恋问题,其指导思想是“早栽秧,早割谷、早结婚、早享福”,早婚的目的是传宗接代,防老养老,养老问题是长期困扰着农村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问题。他们无职业,无固定收入,无养老金,养老只好靠儿孙。建国后,政府对孤寡老人采取了一些照顾措施,改善了一部分老人的生活,但由于我国人口多、贫困面广,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养老保险制度还无法推广。于是,养老的支柱仍是儿孙。又如迷信鬼神固然与思想观念落后有关,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村寨分散,有的小村落连医疗站都没有,看病要步行十几里或更远的路程,且医师水平低,医疗条件差。即便靠近县医院,昂贵的医疗费也使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望而止步。

民族传统意识、习俗的发展还有顺向发展和逆向发展的情况。所谓倾向发展即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方向发展,前面说到的由族内婚向广泛与外族通婚的发展,由“不落夫家”向长住夫家的发展,由鄙商轻商到从事商业活动的发展,由带着迷信色彩的祭祖活动(如苗族的拉鼓节)发展为健康的体育运动、民俗表演以致招商引资等均属于顺向发展。所谓逆向发展即朝着阻碍社会进步,妨碍民族振兴的方向发展,如过去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民风淳朴,团结友爱,互不侵犯对方利益,衣服挂在外面没人要,谷子晾在外面没人偷,真可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五、六十年代许多少数民族村寨仍保留着这些良好的风气。但七、八十年代后,偷盗、赌博、斗殴之风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兴起,有的地方越演越烈。又如婚丧礼俗,过去少数民族地区一般从简。如苗族办婚事,亲朋好友送上八筒米,一条鱼作为见面礼。主家或以油茶待之,或备上一些

串肉(熟肉,一串约二、三两),来贺者,女客每人发一串肉,一坨糯米饭即离去。男客除得到糯米饭和串肉外,还可坐下来喝酒,桌上只有一碗肉汤煮的菜粥和一碗酒,但人们还是乐滋滋的。结婚聘礼不多,建国前融水苗族民间定为一两六钱银子(这是给母亲的“奶母钱”。)外加少许酒肉(视各家经济情况而定)。贫困者出不起聘礼,请不起客,则在深夜里偷偷将姑娘接走了事。群众也不责怪,也不鄙视。可现在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结婚聘礼越来越高,多以千计。请客送礼不断升级,相互攀比。致使一些贫困人家娶不起媳妇。再如办丧事,过去也多从简。以苗族为例,上午人死了,下午就安葬,下午或晚上人死了,第二天就安葬,不选日子不做道场,不立墓碑不扫墓。现在有的地方的苗族死了人停丧数日,请鬼神作法事数日,全村男女老少上门来吃数日,将丧家一年口粮吃光、还负债累累。笔者曾目睹苗族亲戚因丧事不堪重负而频频告急,请求援助的情景。以上这些逆向变异给少数民族生活和生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其产生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少数民族观念、习俗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使各民族都能以新的姿态迈向 21 世纪。

注:

①《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 年 1 月

② 以上材料引自杨文金的《苗族传统婚姻与人口素质剖析》一文,载《贵州民族研究》1988 年第 4 期。

③《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出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本文为系列论文之一,由广西民院科研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 扬 鬃〕

侗歌还会再唱吗？

——贵州榕江考察记

(美) Daniel B. Wright 著 徐新建 译

火灾过后

数月前一场大火肆虐了崎岖多山的小黄寨。当地三分之一的木房化为灰烬。人们再没有心情唱歌了——至少那是寨里两个姓吴的女孩子不久前告诉我的事。

唱歌是这个侗族村寨的生命之源。该村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处在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在这里，女孩们还没开始记事，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就唱侗歌给她们听了。学步以后，她们听的是模仿山雀欢唱、河水流淌以及蝉虫鸣叫的曲调。再长大一些，村里的歌师便将她们分成小组，在每天晚饭后，用歌把侗族的丰富文化传承给她们。

在本村鼓楼的庇护下，大人教孩子们用侗歌来唱自己的历史、习俗和情感。晚上学会后，她们又在白天温习提高——在山路上唱，在放牛时唱，在割草时也唱。

大人同样唱歌。他们组成歌队，自娱自唱。只要你说出一个事由，就会有一首歌把它唱出来：歌唱庆祝，歌唱劳作；说媒时唱，祭祀时唱，接送客人时唱，甚至在丧葬礼仪中也唱。依照侗族说法，“除了唱出来的歌，去世的亲人听不懂任何话语。”

这里的侗族同样有着关于灾难的歌。其通常是在为求生存背井离

乡时便要唱的。可尽管如此，向我讲述火灾使村里人很伤心的那两位吴姓堂姐妹还是说，她们心情不好，连那种“讨饭歌”也唱不出来了。

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另一种力量正蔓延开来，像火灾一样威胁着一个又一个村寨的传统文化。这就是繁荣的力量，亦即来自以汉族为主导的城市现代化之吸引^①。

榕江活力

经过六小时在山区公路的颠簸，我们乘坐的班车终于抵达了拥有一万人口的榕江县城（古州镇）。虽说与州府凯里隔了 200 公里而跟极贫县雷山相邻，榕江看上去却显得明亮和有活力：众多的小吃摊上传来嘶嘶炸食声；人们有目的地来来往往；各种旗帜沿街张开；时装精品店里摆着色彩鲜艳的丰富用品；卡拉 OK 厅发出高声喧闹；三轮的机动车、人力车载着客人沿街穿行。

该镇体现出的活力与其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虽然除了少数木材贸易和基本加工之外便再无其他什么工业，但象中国内地的众多县镇一样，榕江已成了其周边乡镇和村寨在经济发展上的示范性引擎——至少对那些通过公路与之连接的地方来说是这样^②。作为集市中心，县城从周围的农业区域把相关物产吸纳进来，再把各种日用品和其他服务输送出去。在中国内陆的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是激活增长的关键因素。榕江的情况使这一点得到了证明。然而由于我们考察的内容是侗族传统，所以就没有在县城停留，而是沿着与河相伴的公路，步行去东面五公里外的寨子。

承包经营在当地仍很盛行。郊外，有人造了座木桥。桥从水浅的地方架过。造桥者守在桥的一头，向每位过桥者收取 5 毛钱费用（约合 6 美分）。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么交 5 毛钱从这里通过，要么省 5 毛钱然而却多花 15 分钟，绕道由常规的老路过河。

在沿榕江东面的柏油公路上，男人们三五成群地组合起来，用劲将树干砍成几节，然后把菌种涂上去，再放入温室。甚至连老太太也跟着在一旁帮忙打杂。年轻人负责堆放圆木：先在上面浇水，然后用帆布遮

盖起来。在一定湿度下，数月之后蘑菇就长出来了。这些蘑菇是打算卖给城里人的。

几百公尺外，成群的蜜蜂在蜂箱周围像云一样围绕着，朝四周的田野飞来飞去。时逢油菜花开的季节，黄色的鲜花四处盛开。花开之处，花蜜可寻。蜂群的所有者是一户侗族人家。四年前，他们向一对浙江的汉族夫妇买下了90箱蜜蜂（每箱约有一万只蜂）。浙江夫妇带着蜜蜂从东南沿海一直来到贵州^⑥，在这里生活了6个月，把养蜂技术传授给了这户侗族人家。该户人家也是一对夫妇，如今为追赶花期，已在公路边呆了半年。与此同时，他（她）们的父母则照料着已到学龄的孩子。他们也承认活儿繁重，但依然脸露笑容，指望着会有好的收益。

这种可见的活力只是榕江惊人故事的一部分。就象飞往异地的蜜蜂一样，当地大多数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青年，正离开故土向沿海地区和附近城市——如州府凯里和（省府）贵阳——蜂拥而去，去寻求另一种类型的花蜜钱。像蜜蜂一样，这些离家者还会回来。事实上，对榕江来说，这种人类方式的“授粉”，其含义不仅仅是钱，而关联着新思想的开放和接受，并由此带出进一步的发展与进步。

可真是进步吗？我想这还得看对谁而言。无疑的，从许多方面来说，过去的榕江慢吞吞、灰扑扑。没有活力：这一地区封闭、贫困，经济停滞不前。然而，侗歌及其民俗传统却完好的存在了若干世纪。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传统视为愚昧、消极或沮丧。

侗族传统

在侗寨，我们受到了很大震动。在事前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我们于当地每年最盛大的节日“踩歌堂”的前一天到达。该节是为了纪念侗族古代英雄“萨岁”而举行的。“萨岁”的意思是圣祖母。还没进村，我们就听见远处传来阵阵芦笙的吹奏和鞭炮的炸响。接着，盛大的人群出现了：由芦笙头和寨老领头，一群妇女排成单行向我们走来。她们身穿一式的传统服装，还有一位老妈妈手撑雨伞在后面助阵。我们在路边停下，怀着敬慕的心情给队列让路：十、二十、五十……至少有一千五百人

之多的妇女从面前静静地通过。周围的声音只有芦笙演奏和鞭炮炸响。

持续整个上午的游行路线要围绕三个经办的村寨，并从各寨通过，目的是纪念一千年前“萨岁”漫长而艰辛的行程。在那行程中，她带领自己的人民在黔东南河岸安下了家。

在为同胞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萨岁”献出了生命。根据传说，在“萨岁”被杀之后，每个侗寨都派人到现场去拣了一些石头回来，堆在村里。如今女英雄成了神明，从战场上收集来的纪念性石头则变为各个侗寨“萨岁庙”的中心。人们还把石头置于张开的伞尖，象征着来自圣祖母的保护。

半日之后，行程到达高潮，队伍进入一个宽敞的空地——这回的空地是一间中学的操场，接着逐渐绕成一个越裹越紧的圈子，里外共有四层。一千多名妇女开始围着芦笙头和寨老慢慢转圈，手挽着手，转了又转。这时，妇女中的一部分人（歌队成员）忽然就自然地唱了起来。

然后仪式结束。人们回家吃饭。

文化冲突

对榕江城外甚至已开始从事非农经济的侗胞，如何在节日里使其传统复活的发现，使我着迷不已。河岸边的村寨在不同的动力下发生着变化，从经济行为到文化传统。尽管如此，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所持续显示出一点是：虽然传统仍旧存在，习俗和以往的信仰却陷入了困扰。

在村里安静下来的时候，我顺着狭窄的巷子闲逛。巷子里，木房结构的人家一户紧挨一户。我朝住房的里面悄悄张望（大多数人家的房门都开着）。其中所见的一个场景使我驻足不前：在一户人家神龛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幅美国超级明星奥尼尔（Shaquille O'Neill）的招贴画。要是奥尼尔知道他竟然变成了侗乡神灵的话，该有多么惊讶！

然而，（在这方面）更有说服力的是村里鼓楼之一的现状。鼓楼这种大型木建筑是侗族村寨的传统中心。如果说歌唱是侗族的生命之源的话，鼓楼便是他们的组织心脏。每一个侗族共同体都有自己的鼓楼。

若干世纪以来，村民们来到鼓楼，在它的的庇护下审议大事。寨老们在这里评判纠纷，讲述故事。孩子们在歌师带领下，聚集在鼓楼里学唱国歌。一旦遭遇危险，鼓楼里的大鼓就会敲响。鼓声一响，村民们立刻聚拢起来，奔向鼓楼，在族长指挥下抗击入侵者。

我们在村里见到的鼓楼情形却有些例外。为了把鼓楼门打开，小伙子们不得不骑上自行车去四处找钥匙。紧锁住的铁门实际上已把大多数拒之门外了。这座十五公尺高的鼓楼看上去与其说是村寨血脉畅通的中心，不如说更象灰尘扑扑的博物馆。

人们告诉我，这鼓楼如今还在使用，但只是用来开村委会和唱卡拉OK了。就我了解到的情况而言，这些活动是要收费的。

不过，尽管有迹象表明在我们访问的村寨，传统面临因绕；而以“萨岁”的名义所呈现的那充满魅力的半日则又体现出作为整体的传统得到了复苏。

除了对侗乡的探访外，ICWA 的基金项目还提供了经常性的机会去考察其他的非汉民族。实际上，我们就一直生活在非汉民族中间。我们住的地方叫都匀，是贵州三个自治州之一的首府。自治州意味着它的人口半数以上为少数民族^④。少数民族的成员，有农民和市民、文盲和学者、以及政府官员、精英人士乃至城市盲流。他们来自各自不同的背景，如苗族、布依族和水族等。了解这些形形色色的成员，等于获得一个广泛的机会，以考察面对快速的、汉族为主导的现代化，少数民族传统究竟表现如何。

除了个别例外，少数民族的“现代”都市化生活方式越是突出，其族群自身的独特传统就体现得越少。在中国类似于贵州这样的贫困地区，事情基本取决于驻地与公路的远近。在这样的格局下，距离越远，就越穷，同时也就越传统。

然而一旦少数民族的传统与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汉族相遇，事情就都变了。如人们说的那样，“汉化”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成员开始说汉语、穿汉装，一切以汉族为准。

可什么才是“汉”？如果孔夫子见到流行在 1999 年的“汉”文化精